

中國現代學術叢書
第壹卷

俞平伯集

I206.53
Z6217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俞平伯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俞平伯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978-7-5004-6755-7

I. 俞… II. 中… III. 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5859 号

特约编辑 于 生
责任编辑 田 文
责任校对 石春梅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5.5 插 页 4

字 数 373 千字

定 价 4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俞平伯

(代前言)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①。一九〇〇年一月八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籍浙江德清。父亲俞陛云，是文学家，精通诗学，著作有《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蜀辋诗记》、《诗境浅说》。母亲许之仙，是清朝松江知府许祐申（即许子原）之女，亦精通诗文。俞平伯有三个姐姐：大姐俞琏，二姐俞珉，三姐俞琳，皆善属诗文。祖父多病早逝。曾祖父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是清代享有盛誉的学者，著述颇多，有《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俞平伯即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有这样的世家，也就造成他接近文学的趋向”^②。俞平伯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于文学评论，擅长诗词散文，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① 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曾自字直民，号屈斋。

② 穆穆《俞平伯先生》，1943年10月《风雨谈》第6期。

充满诗意的童年和学生时代

俞平伯充满幻想和富有诗意的童年时代，是跟随曾祖父在苏州度过的。俞樾非常疼爱小重孙平伯。他出生双满月时，曾祖父抱他剃头，并赋诗志喜。平伯两岁时，曾祖父又与他在寓中合影、赋诗，作为纪念。平伯四岁时，由母亲启蒙，教读《大学》章句。有时候，大姐教他吟诵唐诗。六岁时，每晚跟曾祖父学写字，直至翌年初，曾祖父病倒，方才终止。这段生活，在俞平伯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曾写有诗句云：“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笞帖教重孙。”俞平伯后来练就一手好书法，即是从小受到曾祖父的熏陶。之后，由父母教学对对子，课本由母亲手抄。八至九岁时，入塾从师学习，接着有一年半的时间，平伯到上海学习英语和算学。十二三岁时，俞平伯即开始阅读《红楼梦》，尽管当时他是当闲书读着玩的，并非深谙书中的蕴涵所在，但毕竟《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在他少年的脑海里烙下深深的印记。这或许是最初播下的“红学”种子。十六岁，俞平伯进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由于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他的智力开发较早，学习成绩优异，所以当年秋天，他即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门。北京大学的黄侃教授，很看重他，指导他读宋代词人周邦彦的《清真词》。俞平伯自此便学会了填词的技巧，暑假在天津养病时，就填写《临江仙》以记其事。

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俞平伯不满十八岁，他就和舅舅的女儿许宝驯结为伉俪。结婚时，按照传统的习俗，遵照岳父许引之之命，戴红绒缨帽、插金花、穿彩绣袍。黄侃教授和大学同班同学，曾前往他们在北京东华门箭杆胡同寓所，祝贺他们新婚之喜。俞夫人字长环（后改为莹环），杭州人，在北京长大。自

幼即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能弹琴、度曲、作诗、绘画，并擅长书法。俞夫人虽年长四岁，但他们夫妻情投意合，终生相伴。俞平伯的著述工作，亦得到夫人的很大帮助。

俞平伯青年时代，思想活跃，思维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富有积极进取精神。因此，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各种进步的学生社团。一九一八年底，他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并成为该社的重要成员，是《新潮》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加入“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由于“浮慕新学，向往民主”，他便积极投身运动。他参加北京大学学生会新闻组织，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年底，俞平伯毕业于北京大学，结束了他学生时代的生活。

一九二〇年初，为了寻找救国之路，他同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到英国不久，因英国英镑涨价，学费筹措未周，便又匆匆回国。四月回到杭州。暑假后，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一九二二年七月，去美国考察教育，在美国因生病而回国。俞平伯虽然在英、美两国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还是了解到不少东西，这对他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很有裨益的。

进步的文艺思想及其新诗、白话文创作

文化教育界对俞平伯的名字，是非常熟悉的。然而，大家对俞平伯其人并非完全了解，尤其他的文艺思想，则更是鲜为人知。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似乎在人们的印象中，俞平伯真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心论”者。其实则不然。俞平伯在他的青年时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文

学艺术方面，他自二十年代以来，就具有了进步的文艺思想。在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社会极端黑暗，俞平伯曾经苦闷、彷徨过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对于文学的性质及反映论问题，一九二〇年，俞平伯在为其友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撰写的序中，就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其一，俞平伯不同意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他认为，“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是不全面的。他最精辟的见解是，说文学作品是“人化的自然”，它“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换句话说，它即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里反映的产物。对此，他是这样论述的：

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依我盲揣，虽没甚不合也不全合。说文学是一种表现何尝错了？但文学是否仅仅一种表现，我很难有积极的回答。文学底作用，与其说是描摹的，不如说是反射的（reflexive）。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好比照相，虽是外物底影儿，中间却经过了一重镜子。文学上底镜子是一重人性：就是我所说底“人化的自然”。这样说，文学原不仅是表现人生，是在人底个性中间，把物观世界混合而射出来底产品。

俞平伯的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俞平伯又说：“文学只是一种混融，只是一种综合……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拢来，合拢来，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同上注）他还说：“我很相信好诗是没有物和我底分别的，是主客观联合在笔下的。”^① 用俞平伯的这些看法，对前几年老调重弹的所谓“文学就是人学”的错误观点，自然也是有力的驳斥。文学是社会生

^① 《做诗的一点经验》，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4期。

活、物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的折光反映，自然不应与社会学的“人学”混为一谈。

其二，俞平伯反对“诗是为诗而存在”、“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错误观点。一九二二年，他在其诗集《冬夜》自序中，对当时有人提出此等论调，就明确地回答说：“这话我一向怀疑。”文如其人。他认为，文艺作品正是作者人格的表现。他说：

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诗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①

当时，俞平伯才仅仅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竟然有如此敏锐的眼光和正确的思想，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能够提出“诗心正是人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的主张，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第一。

第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俞平伯明确地提出，诗要为平民而写，要“创造民众化的诗”。一九二〇年，俞平伯在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序中说：“若要判断诗底好坏，第一要明白诗底性质，诗人对于一切底态度。”其中最本质的问题，就是看诗人是否为“平民”而写。并且，他指出，一般人甚至诗人，往往把“平民的”误会成“通俗的”这个意义，是不正确的。一九二一年，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更加清楚地说：“现今的文艺的确是贵族的，但这个事实不但可以改变，而且应当改变。”为此，他认为首先应当改变社会制度。对康白情主张

^① 《〈冬夜〉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版《冬夜》。

诗是贵族的，只有贵族才有水平欣赏诗的观点，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但是，俞平伯认为自己在创作“民众化的诗”方面，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九二二年，他在其诗集《冬夜》自序中，曾经自我检讨说：“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见《诗》第一期），在实际上做诗，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俞平伯解释说：“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就是正因为我太忠实守着自由和真实这两个信念。所以在《冬夜》里，这一首和那一首，所表现的心灵，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事实上，的确俞平伯在此问题上，思想是混乱而又矛盾的。这从他同时在《冬夜》序中说：“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底拘牵，我不愿去摹仿，或者有意去创造那一诗派。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就不难看出，他既强调要“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又要“表现自我”，这说明他的世界观在形成的过程中，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是何等激烈。

但是，俞平伯毕竟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他思想上经过徘徊之后，又重新拨正了前进的方向，他仍然坚持创作民众化的诗歌的方向。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在为顾颉刚编选的《吴歌甲集》写的序中，极其热情地赞美“吴声何等的柔曼，其唱词又何等的温厚”；并且说：“若打破这看不起乡下人的成见，我们立刻明白诗歌原始的意味来。”一九六一年，俞平伯在校订元代吴昌龄《西游记》杂剧所写《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中，充分肯定了剧中“能够表现乡村人民爱劳动、不羡慕富贵的精神”，和“藐视封建统治者的官僚们”的思想。一九七〇年，俞平伯在河南息县干校，与农民相处，异常友好，并热情地

教诲农民子女识字。即可说明，俞平伯长期以来同情“平民”和提倡“大众化”的文学方向。

第三，俞平伯崇尚文学的自然、真实之美。一九四八年，俞平伯在其《清真词释》序中说：“我前拟‘文章’四论，其一曰文无定法，其二曰文成法立，虽有目无文，亦正无须有文，一言蔽之，自然而已。自然何必草率，切磋琢磨之极亦归自然也。”一九八一年，俞平伯又在《德译本〈浮生六记〉序》中说：“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俞平伯崇尚自然的文学观点，显然是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脱化而来。

其次，也必须看到，俞平伯由于受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他在提倡打破旧体诗时，在其《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的论文中说：“感人向善是诗底第二条件。”这的确认为诗有“劝善”的作用。对此论点，曾引起过讨论。有人就指出“善字的概念也是游移惆怅，没有标准”的。俞平伯对他的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后来已经不再坚持。

在新诗、白话文创作方面，俞平伯是作出很大贡献的。俞平伯“是提倡新体诗的最早的一个人”^①。一九一七年，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呼唤下，俞平伯不怕守旧派的斥骂，站在前列，开始写作白话诗。第二年，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即在《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上发表。针对保守派对白话诗的非难，一九一八年，俞平伯撰写了第一篇白话诗论《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提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词粗俗，万不能

^① 《艺文杂志》编辑部的《俞平伯先生》，1943年9月1日《艺文杂志》第1卷第8期。

抒发高尚的理想”的论点。一九一九年四月，俞平伯创作了第一篇白话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受到鲁迅的青睐，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五四运动爆发，俞平伯便积极投身运动，做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仔细分析了社会上反对新诗的各种论调，又撰写第二篇白话诗论《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连同他的第二篇白话小说《炉景》，同时发表在《新潮》第二卷第一期上，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一九二〇年在杭州，俞平伯与朱自清相识，他们志趣相同，共同探讨新诗的创作与发展问题。在半年的时间里，俞平伯创作了十九首新诗，和《做诗的一点经验》、《从经验上所得做“诗”的教训》、《诗底自由和普遍》三篇论文，论述对新诗的看法，积极扶植新诗的成长。

一九二一年一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俞平伯由郑振铎介绍而加入此会，成为主要成员。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同朱自清、叶绍钧（编者注：即叶圣陶）、刘延陵等创办“五四”以来第一个《诗》月刊，对新诗的创作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俞平伯第一部新诗集《冬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他与朱自清、周作人、叶绍钧等八人创作的新诗合集《雪朝》亦问世。一九二四年，俞平伯的第二部新诗集《西还》出版。他的《冬夜》和《西还》这两部诗集，“风靡初期的白话诗坛”，而且“能融会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的，恐怕只有平伯先生一个人罢”（同上注）。至此，新诗这株新开的花朵，在中国文苑中已经蔚为大观，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茁壮地成长起来。

俞平伯除写作新诗、白话文、白话小说外，他还写了不少白话散文，可称做是名副其实的散文作家，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一

九二四年，俞平伯与叶绍钧的散文合集《剑鞘》由霜枫出版社出版。同年年底，他从杭州回到北京，一直在东城南小街老君堂七十九号宅定居。到北京不久，他即到燕京大学任教。第二年，他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新诗集《忆》出版。

一九二八年十月，俞平伯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后来他又到北京大学兼课。一九三〇年，周作人主编《骆驼草》周刊，俞平伯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据王保生对俞平伯散文的研究：俞与废名由于受周作人的影响，趣味相同，散文的舒缓格调相同，具有“冲淡和平”的气味。茅盾称这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苦闷时期”。

二三十年代，俞平伯在大学执教的同时，先后创作和编辑出版了五部散文集，即《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和《燕郊集》。至此，俞平伯基本结束了文学作品的创作生涯，开始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又据王保生的研究：如果把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即以一九二八年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散文抒写性灵，描景状物，显得文思郁勃，文风细腻绵密；而其后期的散文则一变为“冲淡和朴拙”了。

投身抗日，追求光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俞平伯毕竟是一个具有良知的爱国青年，他再也无法闭门著书立说和安于教学工作了，他以满腔的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先后奋笔抒写了《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广亡征！》、《国难与娱乐》等文章，表现出一片诚挚的爱国的赤子之心。

一九三二年元旦，他在致《中学生》杂志的短简中，大声疾呼，要青年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号召他们应当起来“救中国”，并激愤地说：“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大学南迁，俞平伯因有侍双亲的家庭之累，未能同往。自此，他便“削迹城阴”、“宾从罕过”。在五年之中，他除被聘在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外，很少写文章。这是他最苦闷的时代。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有人来向他拉稿，他说“只是情面难却，便给那些不含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写写稿”，当朱自清得知后，立即写信忠告他“以搁笔为佳”。因此，抗战最后两年，俞平伯再也没有提笔撰文^①。但可以证实，俞平伯在日伪时期，是没有丧失民族“节操”的。据穆穆当时写的《俞平伯先生》文中说：“不过俞先生有一个孤高的性格，说他逃避现实也好；总之他不愿与人相争的，如果拿这种态度当做书生本色看，那么这种逃避现实也可以看做一种节操。俞先生现在的生活，并不甚丰裕，他的职业只在北平中国大学教几点钟课，而且拿的车马费也足够车马费而已。听说：教会色彩的大学，请他去教书，是不可能的。听说前些时候某国立大学也曾下过聘书，他竟也拒绝了，这个，我们很可以知道俞平伯先生的个性和高傲了，他并不是一个贱卖的人。”^②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俞平伯结束了苦闷、锁闭的生活。他欣喜异常，提笔写完长达几千言的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此诗开始写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抒发其“寄迹危邦，避人荒径”、“聊忤幽

^① 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生平大事记》。笔者从此“大事记”中引用许多材料，特向孙玉蓉同志致谢。

^② 1943年10月《风雨谈》第6期。

忧”、十年徒掷的感叹。毕树棠谓此诗：“情辞哀艳，中若痛经世变，深寄慨思，非等闲幽怨之作。”^① 年底，经许德珩介绍，俞平伯加入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九三学社。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俞平伯积极参加九三学社的工作和活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平国民党政府发动警宪夜入民宅，以清查户口为名，大肆搜捕，俞平伯同九三学社十三位同仁发起抗议，并拟《保障人权宣言》，三月八日在《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五月二十二日，俞平伯等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一名教授联合签名发出《北京大学教授宣言》。五月三十日，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百零二名教授联合发表《告学生与政府书》，支持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并对学生要求进行教育改革表示同情。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北平《中建》半月刊编辑部在清华大学召开“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俞平伯应邀出席，他发言说：“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当有时代意义，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为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虽有封建的遗留，还是可以保留的。八月二十一日，与孙楷第、许德珩等五十六名教授签名发表《北平、北大师院二校教授对于当局拘传学生抗议书》。同年十一月四日，与北平各院校四十七名教授签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反对“政府突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所有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俞平伯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斗争及其追求光明向共产党靠拢的进步思想。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期间，俞平伯同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① 《题〈遥夜闺思引〉》，1947年6月27日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校三十人，发表全面和平意见书，表示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的积极支持。同年七月一日，在北京先农坛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俞平伯冒雨参加了此会，会后写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一首，以表达兴奋和喜悦之情。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俞平伯作为北大教授成为校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二年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俞平伯一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俞平伯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还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纵观俞平伯“五四”以来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足以说明他长期以来反对黑暗、追求光明、要求进步，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感情。

名满全球的“红学家”

俞平伯蜚声中国和世界文坛，乃至成为世人瞩目的知名“大人物”，还因为他是“红学”家。他十二三岁时，把《红楼梦》当作闲书读，并未觉得有什么好，在他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记》、《三国演义》和《荡寇志》之类。到他在北京大学毕业时，对《红楼梦》“方才有些微的赏鉴力”。他自己说：“一九二〇年，偕孟真在欧行船上，方始剧谈《红楼梦》，熟读《红楼梦》……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